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  
**中西译理融合**

谢思田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教育部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

# 中西译理融合

谢  
思  
田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中西译理融合/谢思田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4

ISBN 7-80198-482-X

I. 信… II. 谢… III. 编译理论—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6387 号

## 内容提要

本书是谢思田博士摄取论文的部分观点,用中文进一步发展而成,并作为一项独立专题《“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中西译理融合》发表出来,具有促进我国译论发展及译学建设而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求索的现实意义。

## “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中西译理融合

作 者: 谢思田

责任编辑: 杨 奇

---

###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a href="http://www.cnipr.com">http://www.cnipr.com</a>	邮 箱: zscq-bib@126.com
电 话: 010-82000860 转 8324	传 真: 010-8200089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4.875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130 千字	定 价: 19.50 元

ISBN 7-80198-482-X/H·012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序 一

## 读(法语)博士论文《开启中西比较译学的视界——翻译释意观 “信、达、雅”在中国的接受(1898~1998)》

许 钧

记得是在1998年11月27日,我应巴黎第三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前院长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和当时任院长的勒代雷教授的邀请,为该院博士研究生做有关翻译基本问题和中国译学进展的学术报告。那天两位院长都在场,还有著名的国际会议译员乌法拉尔先生。讲座后按例有提问和讨论,提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国学生,他就“信、达、雅”的阐释问题提出如何进行中西译学的比较研究。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尤其是在国际翻译研究界,外国学者对中国译学的发展知之甚少或者基本不了解,对中国译学界关心和讨论的翻译基本问题更是不了解。在这种背景之下,如有中国学者对中国译学的重要理念进行探索,在比较译学的视界下展开中西译学对比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推动中西译学的交流,推进译学理论的建设。

后来得知,提问题的就是谢思田先生。他当时师从国际著名的翻译释意派理论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勒代雷教授,正在做有关“信、达、雅”的接受的博士论文。巴黎高级翻译学院是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翻译学院,塞莱丝柯维奇教授和勒代雷教授是翻译释意派的创始人,在国际译学界享有重要地位。谢思田师从勒

代雷，又能得到塞莱丝柯维奇的教诲，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幸福。勤于思考又有宽阔研究视野的谢思田没有辜负两位释意派大师的希望，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开启中西比较译学的视界——翻译释意观“信、达、雅”在中国的接受(1898~1998)》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于2000年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巴黎第三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

谢思田这篇博士论文的价值是十分明显的，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视野开阔，没有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在中西译学比较的视界下展开理论探索，展现了作者较深厚的理论素养；二是方法得当，论文没有陷入众说纷纭的各家言说之中，而是抓住“信、达、雅”三字在中国的阐释与接受的百年历史，清晰而富有见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脉络，梳理了中国翻译思想的各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三是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格局，在国际译坛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扩大中国译学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从论文的结构看，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颇用了一番心思的。论文分为四大章，另有绪论与结语。第一章为“信、达、雅”的溯源；第二章为“信、达、雅”的否定性接受；第三章为“信、达、雅”的建设性接受；第四章为“信、达、雅”的平行接受。条理十分清晰，结构也很合理。围绕着“信、达、雅”阐释的各家各派各言得到了高度的归纳和明确的界定，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整体把握能力和结构能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深得法国释意派理论的精髓，对“信、达、雅”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合理的阐释。在结论部分所列的一张简表，让人一目了然，具有很强的概括性。

鉴于以上几点，我认为谢思田的博士论文是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现在这本书就是谢思田博士摄取论文的部分观点，用中文进一步发展而成，并作为一项独立专题《“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

---

中西译理融合》发表出来,具有促进我国译论发展及译学建设而进行理性的反思与求索的现实意义。特此为序。

许 钧

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翻译家联盟学术文献委员会委员

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8月22日于南京大学

## 序 二

### 研读(法语)博士论文《开启中西比较译学视界——翻译释意观 “信、达、雅”在中国的接受(1898~1998)》

罗新璋

谢思田先生在巴黎第三大学(巴黎)高等翻译学校[E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eurs, Université Paris III]读博期间,以《Pour un horizon de la traductologie comparée sino-occidentale—La réception en Chine de la conception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Xin Da Ya”(1898~1998)》[《开启中西比较译学视界——翻译释意观“信、达、雅”在中国的接受(1898~1998)》]为题所作法文博士论文,于2000年9月20日公开答辩。法国评委会以“优秀”评语[Très honorable],一致通过。

谢在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攻读时,对西方译论与西方翻译史就有精深了解。论文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及其后百年内的接受史为主干,用法国的“翻译释意理论”为主要参照,比较中西译学的异同,打通中西翻译思想的阻隔。评委认为,论文“深刻、博知、独到”[“très approfondi, intelligent et présenté avec originalité”(M. Lederer)]。其意义,举其大者,有三。

一、该论文全长485页,分引言与正面接受、否定接受、建设性接受、平行接受四大章及结论共六部分,评委主席称“结构宏大,有胆有识,值得称道”[“L'ampleur du projet est hardie et sa

tentative de réalisation louable”(M. Leclercq)]。我国在翻译理论介绍方面,一向是西方译论,包括各派观点,已大量引入,而我国译论,尤其是民族文化精髓的译论长轴,由于“语言障碍”,能加以高度理论化介绍出去的相对较少,出不敷入,基本上不被西方认识,至少不被系统认识。该博士论文以巨大规模,借鉴中外群雄百家之长,把“信、达、雅”多元体系化,作为一个庞大完整的理论体系推介出去。其导师勒代雷(M. Lederer)教授以及塞莱丝柯维奇(D. Seleskovitch)教授,同时也是国际著名的“翻译释意理论”创始人,都深有感触,一致认为:“论文作者撰著了一部有益的大作,把中国在 20 世纪关于翻译的论述传给了国际法语翻译学学界。”[“Le candidat a fait œuvre utile car il apporte aux traductologues francophones la somme de ce qui s’est écrit en Chine sur la traduction au cours du XX<sup>ème</sup> siècle”(M. Lederer)]

二、论文取中西译论比较视角,以西方读者为对象,详论“信、达、雅”,即用西方话语讲中国译论,“在‘信、达、雅’旗帜之下,论文作者提出一出众的、合理的、极品的翻译理论。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作者避开‘中国特色’这一毛病,清楚表明中国优秀的翻译思想与法国大师的释意理论没有明显的差距”[“*Sous le ‘drapeau’ du xin da ya, il formule une théorie remarquablement fine et raisonnable de la traduction. On doit lui savoir gré en particulier d’avoir échappé au syndrome de la ‘spécificité’ chinoise et d’avoir montré clairement qu’il n’y avait pas d’écart sensible entre le meilleur des idées chinoises sur la traduction et la conception interprétative de ses maîtres français*”(评委 V. Alleton 教授)]。理实相同,中西接轨。

三、各国都有翻译,都有理论,但在国际译坛上,大多是西方话语间对话与交锋,对中国译论表现出某种无视或无知。谢的博士论文首当其冲,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中西会通而说我,振中国译



论之声于欧西译坛之巅，始发意义深远，不可估量。

这篇论文，可谓宏制巨构，写出来就需一定的学术根基，而用法文行文，包括一些难译的汉语文言引文，更需相当语言功底。除罗列各派对“信、达、雅”肯定与否定观点时，略见重复，在法语语言运用方面，全体评委一致认为：“论文作者谢先生的母语是汉语，其法语表达质量之高在此应特别加以着重指出。”[“La langue première du candidat étant le chinois, la qualité de l'expression de M. XIE doit ici être soulignée”]谢思田先生的法文造诣与译学研究，受到法国教授学者的高度肯定，相信他在译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必能做出更大贡献！

现在这本书乃谢思田先生博士论文的部分学术思想，经中文发挥著就而成《“信、达、雅”解构视界下的中西译理融合》，以反说正，虽原味有所减损，但谢用心恳切，奉之于众，以飨中国读者。是为序。

罗新璋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译研所客座教授

2005年8月20日于北京

# 目 录

序一	i
序二	iv
绪论	1
第一章 严复的“信、达、雅”与西方的“释意理论”	10
1 严复“信、达、雅”的动态阐释	10
2 严复“信、达、雅”与西方“释意理论”——总体类比	20
3 严复实践“信、达、雅”的释意翻译方法	25
3.1 “雅”方面	27
3.2 “达”方面	29
3.3 “信”方面	33
第二章 “雅”的否定:中西三大翻译观	41
1 “信”与“顺”的论战	41
1.1 对“雅”的否定	41
1.2 宁“顺”而不“信”	43
1.3 宁“信”而不“顺”	45
1.4 “信”与“顺”的兼顾	49
1.5 “信、顺”及其影响	54
2 “信、顺”三极范式的理论解析:中西三大翻译观	56
2.1 “信、顺”派生的三种翻译模式	56
2.2 “宁‘信’而不‘顺’”:中西语言翻译观	59
2.3 “宁‘顺’而不‘信’”:中西排斥的理论和 实践行为	71

2.4	“‘信’与‘顺’的兼顾”:中西翻译释意思象地位的巩固 .....	77
<b>第三章</b>	<b>“达”和“雅”的否定:中西翻译三极忠实模式</b> .....	<b>83</b>
1	“达”和“雅”的否定 .....	83
1.1	陈西滢对“雅”与“达”的否定 .....	83
1.2	否定“雅”和“达”引起的反响 .....	86
2	“信”派体系的理论分解——中国“信”派变体与西方三种翻译结果论模式的同比 .....	93
2.1	中国“信”派论点的概括 .....	93
2.2	完全绝对地忠实于原文:一种不可能的现实 .....	95
2.3	中国的“忠实”翻译实例 .....	96
2.4	中国“信”派变体与西方三种翻译结果论模式的同比 .....	99
<b>第四章</b>	<b>“信、达、雅”的全盘否定:中西翻译的解构主义思潮</b> .....	<b>108</b>
1	“信、达、雅”的全盘否定 .....	108
1.1	泛论式否定 .....	108
1.2	特殊否定 .....	111
2	对“信、达、雅”全盘否定的理论回应:中西翻译解构主义思潮的解构 .....	116
2.1	对泛论式否定的回应 .....	116
2.2	对特殊否定的回应——“信”于意义的否定之否定:中西翻译解构主义思潮的解构 .....	118
<b>结语</b>	.....	<b>132</b>
<b>后记</b>	.....	<b>136</b>
<b>参考文献</b>	.....	<b>139</b>

## 绪 论

21 世纪的到来真正开启了全球化渗透交融的时代,中国也正处于与西方加速接轨的进程。在这一充满新的抉择与挑战的过程中,如果说翻译自有史以来一直(也许永远)是建立中西双边交际不可缺少的子元,那么,中国与西方在翻译“学”上的双边接轨却远未成为现实。稍有译学常识者皆知,西方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翻译学科的探索以来,西方诸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出发,竭力摆脱感情化下的主观臆断和经验感觉,对翻译这一古老的人类跨文化交际命题,试图给予理性化、科学化的解析,从而形成林林总总的翻译文艺学派、翻译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解构主义学派、法国翻译释意学派等<sup>①</sup>,以从不同侧面揭示跨文化交际系统这一“黑箱”的奥秘,为翻译学习、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研究、翻译学科建设等人类活动领域提供相对客观的描述性规范,并与人类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形成网状参照。笔者不拟在此列举其演绎过程(也远非本人三言两语所能尽为),只可概而言之。与西方译论界相比,由于重“实践”轻“理论”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指“文革”劫难),我国现代翻译理论发展形态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比西方译论界滞后。西方译理的层出不穷,自成体系,与我国远古时代的舌人到现代媒体下的奴化形象定式形成鲜明对照,即重实践、重感性的经验论范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纵观

---

① 参见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的译学界,我国译论整体上简约而非繁丰,洋洋大观的译论体系科学化探索寥若晨星,与洋洋大观的翻译实践形成又一强烈对照。在法国对比研学过程中,我们更是深深感触这一点:中国译论神理,如其文化心态,虽则博大玄深,但失其空泛,悟性多于理性、宏观多于微观、经验论多于科学论<sup>①</sup>。以上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中西译论发展的结果向度上,对中西译学间距作出的立体抽象描写。

与传统译理的演绎相交织,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是中国开启当代译学建设的时期,其起始标志是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翻译学的问题<sup>②</sup>。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启蒙于我国对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译介(这一过程至今在继续)。在总结思考与借鉴西方译论成果的基础上,最近一些年来中国翻译研究界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意识不断加强,翻译研究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宽,系统性、科学性和指导性也逐渐提升,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其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所未有,涉及译学众多领域、诸多层面,为译学的深化和创新起直接的推动作用,构成了译学在中国存在的雏形。可以说,中国译学目前已进入全面建设与推进时期,并将逐渐走向成熟。

然而,回顾中国翻译理论界近二十年来所穿越的历程,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随着大规模的西方译论的介入(虽说这种译介及研究的工作也还不尽系统全面),随着新时期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我国译学研究界逐渐产生了一显著的中西译论相互排斥现象。“有的研究者一味推崇西方译论,而否定我国传统译论的价

---

① Xie Sitian. *Pour un horizon de la traductologie comparée sino-occidentale. La réception en Chine de la conception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Xin, Da, Ya” [Fidélité · Clarté · Élégance]*.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ESIT), 2000. p. 472.

② 参见谭载喜:《必须建立翻译学》,《中国翻译》,1987年第3期,第2页。

值,认为我国的传统译论没有科学的定义和统一的术语,更没有系统性,总之,是不科学的;而另有一些研究者则一味排斥西方译论,认为西方译论只能指导西方的翻译实践,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没有指导价值。目前,这种中西方译论相互排斥的倾向仍然存在,甚至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sup>①</sup>。”这一趋势在升级转化后的表现形态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普遍性”与“特殊性”二元关系的热点论争,反映到翻译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定位上,就是近年来出现的以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简称“中国翻译学”)为主轴还是建立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普遍翻译学(简称“世界翻译学”)之间的激战。这种论战仍在明枪暗箭地持续,大有水火不容之势,重在求异弃同,从而成为中国译学界现存的有待解决的主要理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西译学(包括译论)二者“结合”“兼容”的研究工作做得还不够,甚至无足轻重。的确,大凡考察一下中西翻译研究状况,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看到,中西方在译学研究上空缺一个主要环节:系统的中西译理比较研究是中西方译学研究领域一大空白(笔者1995~2000年所作的法文博士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初步尝试)<sup>②</sup>。因此,中西译理-译学比较仍是一有待开发和完善的研究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学界基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品性,探索各自的理论体系,遵循“单向”式发展,缺乏双边融合与交叉。例如,由于语言障碍因素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西方对中国译论知之甚少,更由于文化原因,对中国译理理解片面。若按我们所作博士论文的话说,就是中国译理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系统地被西方认识和了解,西方译学界对中国译理体系是陌生

①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② Xie Sitian. *Pour un horizon de la traductologie comparée sino-occidentale. La réception en Chine de la conception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Xin, Da, Ya” [Fidélité • Clarté • Élégance]*.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ESIT), 2000. p. 9~12.

的甚至是无法了解的(但愿我们在法国所做研究工作的卑微努力已为中国译理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些许促进作用);若从今日实情来看,我国主动推向国际舞台的较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论著也并不多见。换句话说,我国译学的对外“出口”并不那么乐观,中国译理的发展至今没有进入国际译学主流,学术话语的权力仍为西方中心所操控。又再如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系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外国译论引介,且至目前为止已将西方较有影响的翻译理论不断引入入门,但与中国译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却还是零星破碎,缺乏具体性、完整性和科学化,研究范式总体上偏于片面单一(个别研究除外)。有鉴于此,翻译学体系设计家谭载喜先生几年前就已提出了“比较译学”的构想<sup>①</sup>,宗旨不外乎跨越不同的传统与体系,进行中外译学译理体系间双向比较、互补、借鉴和渗透,致达中外译学的交融、合璧与共生。这对完善译学理论体系,提高译学的研究质量,巩固译学的理论基础,确立译学的学术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但就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大多属于宏观体系研究,微观层面的中西译理的内在汇通亟待译界同仁的进一步开发与填充。

进入 21 世纪以来,翻译学在中国的发展走向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王宏印教授继诠释中国传统译论经典之后,提及一主要的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在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现代译论交融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上的相互阐发,互相发明,以期对中西译论的认识在学术互动中加深和扩展<sup>②</sup>。”这是攸关一国学术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求新生的重大问题,不失为一条比较能够“兼容并蓄”的又结合我国现实的译论研究路径、一条推进我国译学建设的探索之路。虽一方面可说“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

① 谭载喜:《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1~182页。

②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

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sup>①</sup>，但另一方面更可以说“翻译作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必然有许多共性或规律，各民族必然积累了可以相互启发和借鉴的经验”<sup>②</sup>。因此，杨自俭先生多次指出，“不要用中国的排斥外国的，也不要外国的排斥中国的[……]，而是应该在二者的‘结合’上下工夫。”<sup>③</sup>按许钧教授的话说，这“不仅仅是(译论研究)方法问题，而是涉及了我国译学建设的方向问题。”<sup>④</sup>两大水土不同、原本相异的学理体系要进行“结合”、进行“嫁接”，一方面自然是“求同存异”，但更多的恐怕是“求同弃异”，因为只有观念上彻底消解“异面”、不一味强调各自“特色”之后，两者才能真正和谐融洽地走到一起，携手并进，反之则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简而言之，中西译论“结合”的重心在于“求同”。因此，中西译学译理的比较，不仅仅是正视二者的不同，而是要更多注重二者的共相性，系统挖掘二者融合交汇的层面与幅度，深入探发并透视二者“形”不同而“神”似之所在，走进共融圈，从而使研究更具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相互否定的)意义，这是我国良性的译学建设方向，同时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趋势。我们现在这本书就是以此精神为导向而定名的，其中研究也是本着这一指南而展开。以上是对笔者从事该项研究的动因所作的一点交代。

进行中西译理的融通研究，首要问题是理清中西翻译理论各自的发展轨迹，而析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尤为关键。整体上观察中国自远古时代至20世纪末叶有关翻译的概念事实、理

①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③ 转引自许钧：《总序》第3页，许钧、袁筱一等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许钧：《总序》第3页，许钧、袁筱一等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论事实甚或经验论,使我们紧紧抓住“信、达、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接受现象,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的方法学探索途径。

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在对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经典论理进行升华之后,于1898年在其译著《天演论》译例言中<sup>①</sup>,提出“信、达、雅”这一影响深远的三字“理论”。“信”即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具体指译者将作者欲言深意融会于心、化为己有;“达”即表达通顺明白,指译者抛开原文语言形式结构,按照译入语表达习惯重组原文意思,同时根据译文读者潜在的知识结构,使译文晓畅易懂;“雅”之于严复是指使用汉以前古雅的字法、句法,借以招徕中国19世纪末的文人士大夫<sup>②</sup>。

“信、达、雅”自诞生以来,横跨大宇长宙、纵越西东。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难以数计的历史文化英杰,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视角,对“信、达、雅”这一理论命题进行了恒久的关注和阐释。攻之者有之,辩之者有之,可谓纷纷扬扬、百花齐放;但诸多群雄仅满足于对“信、达、雅”概念的宏观诠释及其组元合理性的主观臆断,只言片语、众说纷纭、长年累月、积乏生厌。20世纪末的到来几乎敲响了“信、达、雅”的丧钟<sup>③</sup>。由此可见,自严复1898年提出“信、达、雅”以来,中国的翻译行为理念基本上一直未变,中国的译理探讨主流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信、达、雅”展开(其间也部分交织着西方译理),直至20世纪末年<sup>④</sup>。至于20世纪的终结是否也意味着中国传统译论(包括“信、达、雅”)的终结问题,

① 具体参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6页。

② Xie Sitian. *Pour un horizon de la traductologie comparée sino-occidentale. La réception en Chine de la conception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Xin, Da, Ya" [Fidélité • Clarté • Élégance]*.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Paris III-ESIT), 2000. p. 9~10.

③ 参见王东风:《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中国翻译》1999年第1期。

④ 这方面较明显的标志之一是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的沈苏儒所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一书。